



## “抱团养老”牵涉成本分摊、生活习惯磨合、公约制订等各种复杂问题，真正实施起来也不容易。

曾在报纸上读到“抱团养老”的相关内容，朱荣林的妻子王桂芬觉得自家的三层小别墅也可以尝试，别墅里有9个房间，每间房都配备了独立卫生间，很有优势。他们计划招4到5对老夫妻，身体健康会搓麻将者优先，这样生活环境热闹，也有助于驱散衰老和孤独。

老两口的“招租启事”刊登在报纸上后，当时超过100对老人报名，有10人左右入选。王桂芬管理过200多人的厂子，一开始就给“养老团”制定了详细的章程，所有的经济账目都是透明的。“养老团”成立后，每一家都认真执行轮值的规定。当值的那家负责做早饭、买菜、帮厨、洗碗。

接下来的几年里，抱团的老人们由于各种原因来了又走，或不适应，或生活遭遇重大变故，或家中有更年长的老人急需照顾。彼时，发起人朱荣林认为“抱团养老”最大的好处是在经济上摊低了费用，而且大家一起吃喝玩乐，很开心。但问题也有很多，生活上的相处是其中一个因素，相处得不愉快，就不断有人退出。

去年3月下旬，湖南一家报纸征求朱荣林的意见后刊登了重启抱团养老的招募启事。但遗憾的是，朱荣林在2023年去世，他的“养老团”也散了，对此，王桂芬看得很是豁达，“最后那几年，有那么多说说笑笑的人陪伴着，至少老朱是开心的”。

朱荣林夫妇的“抱团养老”案例成功后，国内近年来不断出现这样的案例：

15位老人在北京平谷租了两栋别墅“抱团养老”；广州“7个闺蜜凑400万元同居养老”；上海一退休医生和老伙伴们众筹买下一农村小院，一起生活；上海12位老友共同集资建老年公寓，打算60岁时“抱团养老”……由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深度融合而成的“抱团养老”模式开始兴起，成为公共养老的一种有益补充。王莉莉认为，这样的模式体现出当下的老年人希望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交往，按照主观意愿去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这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是有益的。

“抱团养老”不仅可以帮助老年人克服居家养老的孤独、摆脱养老院养老过于拘束和无聊的生活，而且能够创造条件，

让老年人可以继续学习、社交、做事，甚至创新、创业。“‘抱团养老’对老人的身体条件要求比较高。大家生活在一起的前提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王莉莉说。

不过，“抱团养老”牵涉成本分摊、生活习惯磨合、公约制订等各种复杂问题，真正实施起来也不容易。对此，王莉莉强调，养老模式不是单一存在的，是互相融合的，老年人自发“抱团养老”的同时，也需要社会和家庭等其他资源的支持，比如市场上比较成熟的上门服务、老年餐桌、各类养老服务以及一些文化娱乐服务等，都可以为“抱团养老”的老年人提供服务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抱团养老”模式的具体管理，至今还没有相关的法律规范。遇到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划分、意外伤害责任认定等方面的问题时，应该适用哪一套办法，至今仍不明确，这为“抱团养老”可能产生的法律纠纷埋下了隐患。

从长远来看，虽然“抱团养老”是一种群众自治、政府扶持、社会参与的发展模式，但如何整合更多城乡资源为老年人提供优质服务，如何为“抱团养老”模式提供体系化、制度性支撑，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 国外还有哪些养老模式？

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比日本迟了十五至二十年，日本在养老方面的探索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称养老为介护，以“自立支援”为核心，支持老年人独立自主的长期照护。在提供介护服务的阶段，无论是上门入户服务、居家护理，还是日托服务，其中都有把老人及其家属与各种服务设施连接，让介护服务与需求相匹配的环节，这个环节的具体执行者就是“介护经理人”，这也是随着日本介护保险制度出现的新职业。

介护经理人会亲自走访申请人住所，与老年人及其家属面对面交流，细致观察老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并耐心聆听他们的期望与需求。接下来，介护经理人会根据社区及周边现有的多